

“在”與“屬”的相容和轉化*

——對1950年代香港散文主體性建構的一種考察

黃萬華

[提 要] 香港文學一直包容著“出現／產生在香港的文學”（包括外來、外地作家在香港出版的作品）和“植根／屬於香港的文學”（香港本地作家和外來定居香港而融入香港社會的作家的創作）。戰後，尤其是1950年代的香港散文“在”與“屬”間的轉化、相容，是香港文學獲得主體性的表現，也是香港散文成熟的標誌。定居香港的南來作家成為此時期香港散文的重要代表者。他們在想像中國和想像香港中的個人體驗性，使其在政治立場的制約中仍保持了寫作中的精神自由，而其亞洲想像中定位於世界的中國情懷，也是文化的，而非政治革命的。報欄文章體的發展和學者散文創作傳統的形成是此時期香港散文的兩大流脈，反映出“在”香港和“屬”香港的高度融合，發揮了香港文化的優勢，在提供1950年代文學史的重要經驗中推進了香港文學主體性的建構。

[關鍵詞] 香港散文 1950年代 南來作家 學者散文 報章體

[中圖分類號] I206.7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13) 04 - 0061 - 10

一、“在”與“屬”的相容和轉化：香港文學主體性的建構

2012年，為紀念中華書局成立100周年，《香港散文典藏》出版。散文歷來被視為香港文學中“收穫最大的一環”。如今百年香港文學，散文又成為最先被系統“經典化”的文類。香港散文獨立、成熟的重要時期當是戰後至1960年代，1950年代又是其中最重要的階段^①，而“真正能夠代表香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散文創作成就的，是1938年就來到香港的葉靈鳳，以及曹聚仁、徐訏、吳其敏、黃蒙田等人”^②，他們大都是南來作家，但來後沒有再離開香港。南來作家成為此時期香港散文的重要代表者，具有不可忽視的文學史意義。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戰後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文學轉型研究”（項目號10BZW09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項目“1945～1950年代中國（大陸、台灣、香港）文學轉型研究”（項目號08JA751024）及山東大學人文社科研究重大項目“百年台港澳及海外漢語文學與中華文化傳統研究”（項目號13RWZD01）的階段性成果。

這種文學史意義首先表現為它在中國現代和當代文學之間建立的對話關係。戰後香港有兩撥南來作家，即抗戰勝利後在中共組織和影響下來到香港的數量眾多的左翼作家和1949年後因大陸政局變動而大批湧入香港的非左翼作家，前者在香港的活動“預演”了1950年代中國大陸的當代文學^⑤，而後者所表現的較為多元的創作狀態則更多延續了1949年前的中國現代文學。他們的共存、銜接，使得中國現代文學和當代文學的關係在一個相容的環境中得以呈現，啟發人們去思考以往被視為“斷裂”的文學史存在。同時，香港城市的開放性使得香港文學一直包容著“出現／產生在香港的文學”（包括外來、外地作家在香港出版的作品）和“植根／屬於香港的文學”（主要指香港本地作家和外來定居香港而融入香港社會的作家的創作），而在1950年代以前，“‘在’香港的文學卻可以抽離於‘屬’香港的文學而分立”是“香港‘文壇’的基本情勢”^⑥，這一情勢的存在主要源自南來作家與香港“若即若離”的狀態，以1940年代後期“在”香港的左翼文學及其主張為代表的南來文學與香港社會的疏離狀態，反而使得香港作為文學空間第一次進入中國大陸的文學史敘述。1980年林志浩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1998年錢理群的《1948：天地玄黃》、1999年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1999年陳思和的《中國當代文學史教程》等，都是因為1947年後大批南來左翼文人在香港的活動而將香港文學納入自己的文學史視野。這種左翼文學雖未在香港植根，但密切了香港與大陸之間的文學對話。1949年後，大部分左翼文人離港北上，留在香港的左翼文學的策略變化，開始從“在”香港的文學向“屬”香港的文學變化^⑦，而這種變化在包括自由主義作家在內的南來作家中都明顯存在。

南來作家的文學史意義更在於它給香港帶來了多種不同的文化，使南北的、雅俗的文化都在香港這一空間中互相衝擊、融和，又有不同的傳承和轉化，在延續香港文學原先的發展走向中，既有可能豐富香港文化的移民性、市井性，也有可能啟動香港文化的原生性、區域性。這是一種“在”香港的文化逐步成為“屬”香港的文化。戰後至五六十年代可以說是香港多元而混雜的文化的開始，這才是真正屬於香港文學的時代。恰恰是文化的多元混雜，有利於展開獨立的思想追求。1950年代的曹聚仁會在作品中質疑單一的民族主義歷史觀，對左、右兩種政治偏見都有所警覺，李維陵能在創作接受現代主義藝術影響的同時又自覺批評現代主義的弊病、欠缺^⑧，就在於他們傾向於一種文化時，又能接觸到其他更多種文化。混雜產生著流動、開放、靈活，不斷走出“本土”又返回“本土”，而香港文學正是在這一過程中獲得了主體性。

散文本身具有的流動性、多元性使得它更豐富地反映了“在”與“屬”的轉化、相容。香港文化、香港作家的“在地性”原本就非常開放，它可以接納一切外來的因素；其生活、寫作的越界性又明顯高於中國大陸、台灣等地作家，也與散文文體的雜交性、越界性相契合。香港的本土性又豐厚，會提供各種外來東西植根的土壤，使外來者也適宜香港的環境。當時南來文人不少是新聞業者和學者，前者促進了香港文學中報欄文章體的發展，後者形成了香港學者作家的創作傳統，而這兩者的成就主要就在散文。今天我們讀到董橋在報紙專欄中也寫得一手好文章，金耀基的學術遊記又如此豐厚等等，這些源頭都可以回溯到戰後至1950年代的香港散文，那確實是香港散文獨立、成熟的重要時期。

二、“在香港”的中國想像和亞洲想像：出遊中的精神自由

相對於其他文體，散文的生命力更在於其真切、自由，而這首先構成對五六十年代香港散文的考驗，因為那時候的香港左右翼對峙嚴重，雖無體制性強力干預，但外界的政治壓力是明顯存

在的，作家自身也很難採取完全超然於政治對峙之上的現實立場。而恰恰是在一些相關政治的文學命題上，香港作家所寫的散文，無疑比同時期中國大陸和台灣的散文顯得真切，而保留下這種真切的政治文化環境和作家的個人實踐顯然是非常值得關注的。

想像中國和想像香港同時展開，是此時期香港散文內容豐富所在。對“彼岸”中國想像的光明和對“此岸”香港想像的暗淡一度成為1949年前後香港散文的主色調，反映出散文與時代的密切關係。例如汶君的《送行》寫送別朋友回國，“這城市正如你們所知的，難於找到一朵鮮花插上你底額頭”的失望和“離開這個孤島，回到鄉野……鄉野在新生，百花繁茂，百鳥齊鳴；父老兄弟們古銅色的臉上底微笑……都在歡迎你們！”^⑦的喜悅，對照如此鮮明，確實是“在”香港抽離於“屬”香港的例證，但“在”香港能借“此地”（香港）想像的暗淡展示彼岸（中國大陸）的光明，反映出香港散文所處的某種自由空間。在左和右、中國和西方等對峙中，香港的文化取向並非單一的二元取一，而是在某種悖反共生中“合則成其大”。這使得“在香港”的中國想像即便傾向相異，但都能以個人性體驗展開，從而產生各種對話。

曹聚仁“五四”時期就是《時事新報·學燈》、《民國日報·覺悟》等著名副刊的經常性撰稿人，1930年代更活躍於《申報·自由談》等。他一生著述70餘種，五千萬言中，五分之四以上的著述完成於香港，實在應該被視為香港作家。他1950年8月南來香港，其原因是他在北京大學聽一演講，其中講到中國知識分子的前途像一塊磚頭：“一塊磚頭砌到牆頭裡去，那誰也推不動，落在牆邊，不砌進去的話，那就一腳踢開”^⑧，他自覺是個“自由主義者”，自然不願被砌進牆去，又不想被“一腳踢開”，於是來到香港謀生。然而，他來到香港後發表的第一批文章^⑨由於牽涉到對中國大陸政治軍事等評價，引起香港左右兩派人士的批評，更有《與曹聚仁論戰》^⑩一書出版。即便談文學、談傳統，也難免巨大的政治壓力，曹聚仁甚至因為那些文章“幾乎想自殺”^⑪。例如他的《虛無主義——灰色馬》一文從一本很流行的西方現代主義小說《灰色馬》在1920年代翻譯介紹進中國的舊事談起，回憶魯迅、茅盾、鄭振鐸、俞平伯等的人生態度，認為“把魯迅拉入神龕，奉之為神明”是“不可解的”，因為“虛無主義伴著文藝，成為她的根苗，仍是必然的。而一個文學家，滿是濃重的虛無氣氛，也是必然”^⑫，結果遭到不同政治力量的批評。面對左右翼對峙的局面，曹聚仁決定擺脫對新中國非歌頌即批判的左右翼模式，“從衣、食、住、行（生活必須條件）、娛樂及享受這些小節目上看起”^⑬，來寫新中國。於是，他以新加坡《南洋商報》駐港記者身份，六次北上，根據自己在大陸的親身考察，寫成了《北行小語》（1957）、《北行二語》（1960）和《北行三語》（1960）等作品。儘管曹聚仁此時的思想已非他自稱的“既非左又非右又不中立”^⑭，《北行小語》的時間又正值中國大陸“雙百方針”提出、反右尚未發生之時，所以，《北行小語》所看到的新中國偏向於一個左傾作家所見到的較為穩定的時期的新中國；到了後兩本“北行記”，曹聚仁對“自由”的理解已有了“為集團而犧牲個人的自由”的想法，思想更贊同左翼的傾向，但他“知道在中共政權之下的生活是不自由的”，而他又看到“台灣的口號和大陸的口號是相同的，有集團的自由，才有個人的自由”，這使得他有可能走出“於國共外並無其他途徑可走”^⑮的現實政治圈子，以個人化的左傾立場去觀察生活。他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感受到，北京“社會上有地位”、“學識見解自不必說”的人士“對於海外情形之隔膜，其天真得可笑，正和鄉曲之士差不多”，“甚矣，解蔽之難也”^⑯，所以，他堅持“凡是宣傳性的話，我一定不寫”^⑰的立場。而他關注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就開啟了一種迥異於此時期中國大陸遊記散文的視角和寫法，甚至影響了日後香港作家的遊記寫作。

曹聚仁第一次北行是在1956年7月1日，他第一批“北行小語”就是從自己看到的日常衣食住行來展開的。“安於‘樸素’的生活”是他對大陸民眾生活的最深感受，而他也儘量用樸實的眼光、平實的筆觸去寫大陸之行。他既以香港生活為參照，更以大陸的今昔對比為尺度，“拿香港生活算作標準的話，廣州人士的生活享受，也可說十分單調的”，而且似乎毫不講究，例如“只有一種鮮桔水，浸在涼水裡算是冰了的。那挑擔的，在烈日下挑過，那桶冷水，快要半滾了”；但如果和他們自己的生活相比，“此間人民，也頗能樂其所樂”^⑧。他以自己親身體驗的生活細節來敘述大陸現狀：“為了要體驗得真實一點”，他“時常獨自溜出去吃小館子”，關注“涉及一般人的食品”，例如“到一條小巷口（廣州）的粥攤吃宵夜，一碗艇仔粥（人民幣二角），加上一隻雞腿（人民幣三角五分），也吃得相當滿意”，儘管相對於當時中國一般城市居民一天三、四角的伙食費，這在日常生活中還顯得奢侈，但節假日，“一般小市民，都腰裡有點錢，都享受得起”^⑨。他既密切關注到“‘百家爭鳴’的傾向，把言論的尺度放寬了”的大局形勢，也細細觀察路人臉上“熙然怡然的神情”，事事都有自己的切身感受；於事實也不回避，既承認“看到了日常生活資料的緊張情況”，也一一展示了平民百姓可以“享受一番”的飲食去處；在判斷上，他也以“人之常情”去理解不同的看法，例如，他去看北京煥然一新的陶然亭公園，既領會“陶然亭已經返老還童”的讚賞，也理解“原來那點詩意都給‘建設’掉了”的批評^⑩。這使得“北行小語”情、理皆有。

除了日常化的觀察，曹聚仁的《北行小語》還以自己的親身見聞，對國家體制、社會道路等重大問題作出了觀察，例如他寫到了中共八大期間，毛澤東也“承認一黨制不一定是最好的制度，也說，在階級鬥爭終了後，也可以容許兩黨的並存”，^⑪他甚至由此認為，“新中國的政治，實際上已經走向兩黨制的道路了！”^⑫這些對於日後人們認識1950年代中國政治環境、社會主義在中國的展開，顯然有其價值。

有個插曲這裡也可論及。當時，由華人華僑組成的星馬貿易代表團也在中國訪問，新加坡中華總商會的代表莊惠泉寫了《大陸觀感》一文，講述了大陸“一元化”、“組織化”的社會狀況，“任何言論和任何批評，都被限於共產主義的範圍之內”的“有限自由”，“軍人的生活為最好。次及工人，再次則是農民，最苦者仍為小資產階級和一般市民階級”的日常生活，以及“一方面在更改歷史文物，破壞人民的祖墳，另一方面卻極力在各處建築各種各樣的紀念碑”等文化“偏差”情況。^⑬儘管曹聚仁的大陸觀感非常不同於莊惠泉所言，但他仍承認莊惠泉的《大陸觀感》“大體也很公允，並不帶反共八股的氣味”^⑭，從而承認了觀察大陸可以有不同的角度、不同的結論。這樣一種觀察的立場、態度，使得“北行小語”一類的遊記寫香港以外的題材，卻讓人真切感受到香港的文化氛圍。

“‘遊記’乃現代散文之大宗”^⑮，更是香港散文之大觀。香港本來就是一座自由出遊的城市，不同於中國大陸此時作家的出遊往往是官方組織的出訪，香港作家以個人身份出入於世界各地，遊走於各種社會制度、文化空間之中，遊記寫作興盛，日後形成了“旅遊文學”的流脈，這種“旅遊文學”的重要特徵就是“出遊”中精神的自由、感受的真切。1950年代的香港作家也很難擺脫具體的政治立場，如何在政治立場的制約中保持寫作中的精神自由，曹聚仁的《北行小語》是可以給人以豐富的啟迪的。而在遊記寫作中，香港散文也開啟了“香港與亞洲”這樣一個重要的話題。亞洲出版社、亞洲影業有限公司等都是1950年代香港重要的文化機構，《亞洲週刊》迄今仍是發行世界的很有影響的香港刊物。也許它們難免政治背景，但也說明從1950年代

起，香港文化的性質與其和亞洲的親密關係分不開。當時不少香港作家寫有亞洲訪問記，由此展開的亞洲想像也反映出香港在“國家”和世界間的定位和思維。也斯曾注意到1950年代香港散文中亞洲想像的兩種情況，一是從“懷想的古國之思的中國”出發“去看世界”，一是從“包涵各民族各文化”的視野出發，“回到歷史”去看世界。⁹前者如司馬長風，他的散文集《北國的春天》（1959）寫日本、馬來西亞之遊，卻“無處不見其對中國的懷念”，日本之遊會時時想到傳入日本的中國文化，馬來西亞之遊“所見都是中國人”，極少談到“國家”之外的諸如不同文化的互相影響等內容；後者如桑簡流，他1950年代在香港研究中亞文化交流史，提出“中國歷史文化是由中亞洲（西域）和中原中國合成的說法”，並將“中國”一詞“從古突厥文字源的意義把它解構成‘大海’，一面廣淼且可以包涵各民族各文化的大海，一個可以容納中原和中亞的思想文化的‘中國’”。¹⁰這樣一種“中國視野”使得他的《西遊散墨》（1958）寫歐洲，寫亞洲，在廣博的見識和開放的思維中呈現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交匯。桑簡流的散文更多地屬於香港，一種定位於世界的中國情懷，但它是文化的，而非政治革命的。1950年代，香港能取代大陸、台灣，承擔起在海外傳承中華文化薪火的責任，與這種文化情懷是分不開的。

三、植根於香港的學者散文

曹聚仁此時也較快融入香港社會，其講述香港生活的散文也以真切感人而為後人所關注。《欣廬的春天》（1952）就是一篇至今讀來仍感人不已的散文，文前引王荊公詩“誰能胸臆無塵滓，使我相從久未厭”，在被視為金錢至上、人情冷漠的香港商業社會，在離家漂泊、無所依附的境遇中，定居香港才兩年的曹聚仁卻在簡陋狹窄、“不便於家室之好”的欣廬公寓中感受到了猶如家室的鄰里之情。房客的“年齡心境，都接近秋冬之交的季節”，但大家“相濡以沫”，“有著這麼一個溫暖的春天！”文章的講述異常親切，而在具體人事的描寫上，又極有分寸，寫得恰到好處，謔而不虐，頗有相知相交甚深之感。“欣廬的風氣”歷歷在目，房客大多是小商、勞工階層，任職報社的“我”“似乎不屬於欣廬這個大集團的”，而且彼此之間的政治傾向也大相徑庭，“一個親美，一個親蘇，一個要反攻大陸，一個要解放台灣”，“彼此的期待、憂慮和愁思”如此不同，然而，大家在日常生活中卻“像大家庭似的，故此交往得好，並無牆壁間隔著”，而且不管是“批評蔣介石”還是“罵毛澤東”，皆是自發的個人感受，又有自由談論的空間，大家反倒能坦誠相見，毫不影響“熱熱鬧鬧地相處”。這種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能消解嚴重對立的政治立場，而且只要沒有體制性強力的壓迫，不同的政治立場反而是一個社會的正常形態，和百姓的日常生活也能融洽相處。此類生活散文也成為1950年代社會生活的珍貴面影，它所留攝的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有著豐富的歷史信息和啟迪意義。

《欣廬的春天》反映出在1950年代初，南來作家的散文創作就開始了“在”香港和“屬”香港的融合。此時的葉靈鳳、曹聚仁、徐訏等南來作家的創作還提供了“學、識、情”“合之乃得”¹¹的學者散文，而這成為日後香港散文的重要一脈。葉靈鳳等的學者散文談天論地，出入古今，懷舊敘事，自由無拘；各有個性，但心靈自由則都大致相似，且都有濃厚的文化氣息，在消費文化主導的香港也占一席之地。曹聚仁的《章太炎先生》當是香港散文精品之一。曹聚仁當年是章太炎最年輕的弟子，21歲時將章太炎的演講筆錄批註出版，對章太炎自然知之甚深，但他談論自己老師才高學精氣傲又放得開，令人覺得師生之間對話的自由無拘。文章從錢塘輪渡兩位乘客對章太炎學問的推崇反倒是對章太炎的“污辱”、“否定”這一有趣的“反諷”現象說起，妮

娓娓談章太炎治學為人於“登峰造極”之中的獨到之處，其慨嘆的“太炎先生的學問，有如一棵大樹，枝枝節節是無從瞭解他的”，就不只是對單個歷史人物的感嘆，而包含知人論世的真知卓見。文筆書卷氣濃，與章太炎相稱，但一般讀者又讀得懂。這種學者散文有個性，又能在香港生存，甚至慢慢根植於香港了。

葉靈鳳被曹聚仁視為“朋友中，書讀得最多的”^⑧，“他把自己關在家裡，也就是關在書裡”^⑨。知識的淵博使他給報紙寫文章時任何內容都可以成為一個談天說地的“由頭”，進入後就能涉筆中西古今，種種見聞掌故融於一爐。尤其是他的讀書隨筆，從較早期的《忘憂草》（1940）、《讀書隨筆》（1946），到晚年的《北窗讀書錄》（1970），葉靈鳳的“書話”成就了他創造社時期後又一個出色的文學成就，也樹立了中國現代讀書隨筆的一座豐碑。他愛書如命，視俄國出版家綏青的一本書名《為書籍的一生》為座右銘，又善於從書及人，所以不管是域外書談，還是香港書錄，他都能在自己的喜歡中寫出讓讀者也如讀此書而受益的感受，旁徵博引中富有審美情趣，又常常融入書的作者的生平、趣聞，甚至想像此書問世後的遊歷、遭遇，由書及人滲透出豐富的歷史感，讓人出入於各種人生和文化空間，筆調則如友朋之間聊天那樣親切，讀來自然興趣盎然，連唐弢先生也稱讚他“是此中的能手”^⑩，確實稱得上現代讀書隨筆中的上乘之作。葉靈鳳的讀書隨筆涉獵廣泛，從宗教到自然科學，還有“性”（所謂黃色小說），都會引起他的興趣，涉筆成文。五六十年代，他以“白門秋生”、“秋生”等筆名在多家報刊發表《書淫豔異錄》、《歡喜佛庵隨筆》等，都是就西方文學中性內容所寫隨筆，這些“從俗之作”中種種趣談自然有在香港社會賣文為生的因素，但筆觸乾淨，雖無大學問家的心境，但也非寫俗媚俗，反倒有俗中求雅之意。既不孤芳自賞，也不隨波逐流，為生計寫作，寫作有性情、修養、道德，是葉靈鳳此時的寫作狀態，如何在現代商業社會看重交換價值的環境中立足且自得樂趣，葉靈鳳的這一類讀書隨筆可以給人啟迪，也包含1950年代香港文學的經驗。

學者散文植根於香港，自然與香港的歷史、文化開始水乳交融。葉靈鳳是南來作家中寫香港最多的散文家，被人稱為“將香港的歷史與風物寫入一書”的“首推”者。與抗戰時期來到香港的其他中國內地作家的“客居”心理不同，葉靈鳳初到香港就有心用力收集香港歷史方志，香港淪陷後，“不少稀有的書籍從深宅大院流落出來”，他“勤奮”地“收羅到這些書籍，視之為瑰寶，而且下了功夫在這些書籍裡挖掘出他所需的東西”^⑪。葉靈鳳也沒有以往南來作家的“中原心態”。早在1940年代，他就慎重認真地宣稱：“不管你是喜歡還是憎惡，香港終是一個重要的研究的地方”，“不論你所注意的是國際問題也好，中英關係也好，歷史考古也好，甚至草木蟲魚也好，香港這地方都可以提供豐富的資料不使你失望”^⑫。這甚至可以視之為葉靈鳳的“香港情結”，他對香港眷戀如家。1953年，他在《大公報》副刊專欄發表百餘篇“香港方物志”（1958年結集為《香港方物志》），將香港的天華物寶、年節風俗、掌故傳統一一親切道來，有如娓娓而談故鄉。例如談“香港的野蘭”，實有對“香港僅有三百九十方里的地面”之豐盛的喜愛（《香港的野蘭》），其中更有作者在香港野外攀附觀賞的實地體驗。如果與他《江南的野菜》一文中所寫江南小兒女清明時節郊外“挑野菜”的情趣，回想中娓娓而道故鄉野菜的興致相比較，會感覺到，兩者都在對野物“歷史”進行文化描述中顯示知識的淵博，交織成一種平和中有嚮往的意境，情致真摯感人，葉靈鳳對久居香港也有幼時故鄉之情之感了。

葉靈鳳的“香港意識”是和他的中國意識密切關聯的。1960年代，他以“霜崖”的筆名寫“香江舊事”（1968年結集為《香江舊事》）出版，其他散見文章則在他去世後被編入《香港的失

落》、《香海浮沉錄》、《香島滄桑錄》三書），以類似歷史劄記的方式圍繞香港被殖民的歷史放筆縱談，詳實的史料考證堅實支撐起他對於香港和中國大陸血脈聯繫的關注，關於香港的豐富的資料引證時時流露出對香港的眷顧之情，而對於殖民者的深惡痛絕也溢於筆端，如《香港的失落》一書中《香港被占的經過》等文將香港被割讓過程中英國殖民者以堅船利炮和欺詐手段相繼佔領港島、九龍、新界一一細述，而他寫香港風物，是“將當地的鳥獸蟲魚和若干掌故風俗，運用著自己的一點貧弱的自然科學知識和民俗學知識，將它們與祖國方面和這有關的種種配合起來”^⑧。他寫香港還會融入自己深切的懷鄉之情。客居香港，“他懷念家鄉的筍脯、野菜、晚香豆和櫻桃，他想念家鄉的鹽水鴨、菱角、香肚甚至微小如豆豉、生薑、涼麵和火燒的情調”^⑨，當他寫香港種種風物時，此種“懷念”使其所述更加情意綿長。

在“中國意識”的浸染中，葉靈鳳還寫過不少思親憶舊文字，意境沖淡，文筆明淨，《晚情雜記》一書和《回憶的花束》系列文章憶及從“五四”創造社時期到三十年代左聯時期的故交舊友，因為寫於香港，雖有作者個人的歷史顧忌，但絕少中國大陸、台灣的政治高度禁忌，從魯迅、郭沫若、郁達夫到林語堂、杜衡、夏衍等三四十位中國新文學史中的重要人物，都在他筆下得到歷史呈現。如果注意到此時曹聚仁、李輝英等南來作家也都以憶舊散文回顧五四新文學，而司馬長風也已有中國新文學史論述，那麼，可以說，葉靈鳳的此類散文參與了“在”香港的中國新文學史的建構，另開了中國大陸、台灣之外的另一文學史建構流脈。這也是因香港而生發的中國歷史敘事吧。

四、報章體：香港主流文化的一種開啟

香港社會的商業性、開放性使香港散文在實用性、閒適性、趣味性、多元性上有充分的發展，報紙專欄文體的興盛使文化散文隨筆、通俗專欄雜文、現代藝術散文等都有長足的發展。這些都是中國內地和台灣的散文無法替代的。“研究香港文學”要注意的“第一是報章副刊，第二是文藝雜誌，第三才是成書的作品”^⑩，報章體在香港文學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香港報紙專欄文體最有特色的是散文，它在五六十年代迅速發展，1970年代進入鼎盛時期，其展示的香港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成為其存在的最大價值，作家的文化修養和創作個性也得以呈現。以香港第一個以個人名字命名專欄的作家十三妹（原名方丹、方式文，1948年來香港，1970年去世）為例，她在《新生晚報·新趣》和《香港時報·淺水灣》分別開設“十三妹專欄”（1958.11~1964）和“十三妹漫談”（1960.2~1962.6），短短數年中，刊出2,900餘篇文章，約350萬字^⑪，加上她在《大晚報》、《工商晚報》、《明報》、《新民報》、《新晚報》等開設的專欄，她成為此時期最受讀者歡迎因而影響最大的專欄作家之一。而她的專欄創作及其環境也頗能說明此時香港散文的狀態。

“言論自由……嘲左諷右，都無問題，作者也比較的出現自己的風格”^⑫，是十三妹最先開設專欄的《新生晚報》的環境，在此環境中，十三妹才得以脫穎而出。“寫最新鮮熱辣的”是十三妹撰寫專欄的“原則”^⑬，因為“這個世界是天天在變動著的”，讀者需要看到“新的觀點，新的書籍，新的動態，新的消息”^⑭。十三妹專欄的“新”，首先得益於作者直接閱讀《紐約時報》、《費加羅報》、《紐約客》、《大西洋》、《新聞週刊》等美、法權威報刊^⑮，敏捷取材於這些影響大的報刊所載文章，視野開闊，題材格局多元而及時，且以文化、教育等現象分析為重點。十三妹去世時，有人感嘆：“為什麼看她的文章？……因為她使我知道有湯恩比，

因為她使我知道佛洛伊德。”^④其次，十三妹文章“罵人”也使她文章“意氣風發”，無枯燥之意。十三妹自稱“上不沾天下不落地，既不服左也不服右”^⑤，她為人獨來獨往，撰文左右開弓：“罵過大小報紙老闆，罵過左派、罵過右派；拿人民幣、台幣、綠背的，統統都給她罵過了”^⑥，而她並非以罵吸引“眼球”，而是以其率性無忌的文風，表達自我，針砭香港，這種不依附於左右政黨、不仰人鼻息的寫作使其既避免了政黨政治可能造成的僵化、狹隘，也超脫於商業出版、世俗趣味等因素的制約，其文也新意不斷了。而其新意迭出恰恰又擴大了其知名度，增強了其生存於商業社會的能力。十三妹在專欄寫作上文體意識自覺，她堅持“一無政治傾向，二不出售黃色”^⑦，自覺於身處“節奏如此其緊”的時代，“專欄文章，實作者之所思所感所受者也”^⑧，因此，努力拓展自身，廣泛吸取營養，充分展露個性，坦誠相待讀者，雖有時難以避免賣文為生的匆忙草就之病，但其個人化寫作還是提升了專欄散文的質量，尤其是其大膽直言，“提出許多從來在此間所謂之文化界，所未夢想到的與不敢想的題目與題材來”^⑨，從歐美最新的哲學、文化思潮到五四以來知識分子道路，直至香港台灣當下的武俠、偵探題材創作一一涉及，大大拓展了專欄散文的視野和格局。此時期，在大陸的周作人、在台灣的胡蘭成等都關注十三妹之作^⑩，可見其文的影響了。

“主流文化是指起主導作用、大眾喜聞樂見的文化，他在一個國家中產生，在全球構成競爭實力。”“‘主流文化’具有其積極含義，並非精英文化，是一種大眾文化，說得消極一些，‘主流文化’是經過設計的標準化的‘商業文化’”，它有“不同含義帶來的朦朧感”^⑪。在漢語文學中，香港文學是最早啟發人們這樣去思考社會的主流文化，日後，包括電影等藝術在內的香港文化也是以雅俗溝通中的大眾文化在全球顯示其競爭力，甚至完成東西方文化的某種對接。而這一過程在五六十年代香港專欄散文中可見端倪。當時，很多人“只為了看十三妹”才買《新生晚報》^⑫，十三妹專欄成為讀者來信支持最多的專欄，事實上已進入香港主流文化。而十三妹實際上是最早忠實於“自己半知識分子半大眾的錯位風格”，實踐著“以大眾方式書寫‘高端文化’”，早早捷足先登，掌握了大眾文化的規則。十三妹之後，胡菊人、戴天、李英豪、陸離等專欄作家湧現，所談“文化、藝術話題更深刻”^⑬，使1960年代香港專欄散文走向成熟，並形成了學者、文人都關注專欄寫作的傳統。後來有人視“香港文學的精華在散文，而散文的精華在董橋”，董橋也寫每週五日“應景時評”的專欄，而“董橋的此類文字，最能見出化‘悶局’為‘風景’的功力非凡，比起他得心應手的玩物懷舊，更值得細加品味”^⑭，而且這種“別創一格，雅趣盎然”的時評專欄刊登於港聞、社評的重要版面，對“政人政事趣味不高”而閱讀人眾多的新聞版面確是一種在提升中產生的影響。董橋之文自然超越十三妹，也可見到專欄文章從十三妹那個年代開始的流脈，這是香港散文流變的重要內容，是“在”香港和“屬”香港高度統一所結出的成果。

戰後，尤其是1950年代的香港散文，不同於中國大陸“政治的大我”取代“散文的小我”的流變，也不同於台灣在政治高壓下對五四散文傳統艱難的傳承，其“在”的開放和“屬”的深入，推進了香港文學自身主體性的建設，也確立了香港文學在戰後中國文學中的重要地位。

①這一時期，香港出版的散文創作集超過300種，數量尚少於小說集，但年度散文數量在增長，1950年代

初期每年出版的散文集六、七種而已，1950年代中期後，每年不包括評論集在內的散文集都在10種以上，

- 多的年份則有十八、九種散文集問世，而報紙副刊的散文專欄更相當豐盛，眾多刊物，包括《文壇》、《文化雜誌》、《星島週報》、《青年文友》、《人人文學》、《當代文藝》等也都是散文的重要陣地。
- ②陶然：《多元化的香港散文——〈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散文卷〉代序》，陶然主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散文卷》，香港明報月刊出版社、新加坡青年書局，2011年，第7頁。
- ③黃萬華：《1945~1949年的香港文學》，北京：《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04年3期。
- ④黃繼持：《香港文學主體性的發展》，鄭樹森等：《追蹤香港文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8年，第91頁。
- ⑤黃萬華：《戰後中國左翼文學的三種形態及其文學史意義》，濟南：《文史哲》，2013年3期。
- ⑥也斯：《香港文化十論》，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69頁。
- ⑦汶君：《送行》，香港：《華僑日報·文藝》，第105期（1949年5月22日）。
- ⑧曹聚仁：《南來記》，香港：《星島日報》，1950年9月4日。
- ⑨曹聚仁時任《星島日報》主筆，從1950年9月4日至20日，他在《星島日報》連續發表17篇討論新中國有關問題的文章，總標題為《南來篇》。
- ⑩馬兒等：《與曹聚仁論戰》，香港：永泰祥印刷公司，1952年。
- ⑪杜家祈、馬朗：《為甚麼是現代主義？——杜家祈、馬朗對談》，香港：《香港文學》，第224期（2003年8月）。
- ⑫曹聚仁：《虛無主義——灰色馬》，香港：《文藝新潮》，第1期（1956年2月）。
- 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曹聚仁：《北行小語》，北京：三聯書店，2002年，第14、407、61、13、39、41~42、134、72、120、121頁。按：此版本包括《北行小語》、《北行二語》和《北行三語》，其篇目順序、文字內容與原香港版本一樣。
- ⑳鄧珂雲、曹雷編：《曹聚仁卷》，香港：三聯書店，1998年，第237頁。
- ㉑莊惠泉：《大陸觀感》，作為附錄收入曹聚仁：《北行小語》，第154~162頁。
- ㉒㉓黃子平：《〈香港散文典藏〉序言三篇》，香港：《城市文藝》，第59期（2012年6月）。
- ㉔㉕黃淑嫻等編：《也斯的五十年代 香港文學與文化論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3年，第121、127頁；第123、127頁。
- ㉖董橋：《這一代的事·自序》，台北：國神出版社，1986年，第2頁。
- ㉗劉以鬯：《記葉靈鳳》，陶然主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散文卷》，下冊，第12頁。
- ㉘絲韋：《葉靈鳳的後半生》，《絲韋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2年。轉引自李廣宇：《葉靈鳳傳》，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53頁。
- ㉙柳蘇：《香港文壇剪影》，北京：三聯書店，1993年，第21頁。
- ㉚馮亦代：《讀葉靈鳳〈讀書隨筆〉》，北京：《讀書》，1988年8期。
- ㉛葉靈鳳：《〈香港史地〉發刊詞》，香港：《星島日報》，1947年6月5日。
- ㉜葉林豐：《一九五八年初版〈香港風物志〉的前記》，葉林豐：《香港風物志》，香港：上海書局有限公司，1973年，第253頁。
- ㉝黃蒙田：《小記葉靈鳳先生》，《葉靈鳳卷》，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1995年，第451頁。
- ㉞黃繼持等：《香港新文學年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九年）三人談》，鄭樹森等編：《香港新文學年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九年）三人談》，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0年，第9頁。
- ㉟㊱樊善標：《案例與例外〈十三妹作為香港專欄作家〉》，香港：嶺南大學《現代中文文學學報》，2008年8卷2期~9卷2期合刊。
- ㊲司明：《小塊文章·比較自由的園地》，香港：《新生晚報》，1959年3月6日。
- ㊳十三妹：《十三妹專欄·一扯扯到“拋浪頭”》，香港：《新生晚報》，1961年3月9日。
- ㊴十三妹：《十三妹專欄·與三位女讀者聊天兒》，香港：《新生晚報》，1962年7月28日。
- ㊵十三妹：《十三妹漫談·覆台大讀者及其他》，香港：《香港時報》，1960年11月25日。十三妹在文章中說：“若你不弄通一種外國文作工具，你的視野無論如何打不開”。
- ㊶黃霑：《悼》，香港：《明報》，1970年10月19日。
- ㊷十三妹：《十三妹專欄·吃黃連冷暖自家知》，香港：《新生晚報》，1963年3月16日。

④④費甸：《火辣辣地來，靜悄悄地去——十三妹這個人》，香港：《中國學生週報》，第953期（1970年10月23日）。

④⑤十三妹：《十三妹漫談·商業世紀之語文與文化》，香港：《香港時報》，1960年2月28日。

④⑥十三妹：《十三妹專欄·從行家使我發嘔想換版頭名稱談開去》，香港：《新生晚報》，1962年8月14日。

④⑦十三妹：《十三妹專欄·打抱不平是讀者，這十三妹不是那十三妹！》，香港：《新生晚報》，1962年8月13日。

④⑧可參閱樊善標：《當胡蘭成遇（不）上十三妹》，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香港教育學院中國文學文化研究中心合編：《都市層樓——香港文學

論集》，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198～211頁。

④⑨[法]弗雷德里克·馬特爾：《主流：誰將打贏全球文化戰爭》，轉引自李乃清：《馬特爾 撥開全球文化戰爭的迷霧》，廣州：《南方人物週刊》，2012年第24期。

⑤⑩樊善標：《火辣辣的人與文：十三妹和她的專欄》，香港：《香港文學》，第312期（2002年12月）。

作者簡介：黃萬華，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濟南 250100

[責任編輯 陳志雄]